

教育经济学资料

(内部参考)

一九八五年 第一辑

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

中心资料室编印

目 录

· 教学与研究动态 ·	
经济研究的新课题和教育经济学的动向	厉以宁····· 1
· 教育经济思想史资料 ·	
我国先秦教育经济思想类编	刘源鉴····· 2 1
· 国外教育经济学文献选译 ·	
人力资本投资	西·W·舒尔茨····· 2 8
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分析	加里···贝克····· 4 5
教育与经济增长	E·丹尼森····· 1 0 1
舒尔茨和丹尼森与教育投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玛·J·鲍曼····· 1 1 7
· 短 讯 ·	
我国教育经济学会成立·····	2 0
山西省教育经济学会成立·····	2 2
· 新书预告 ·	
《三个面向与教育改革》·····	1 4 2
· 刊物选介 ·	
《黑龙江省高教研究》·····	1 4 3

经济研究的新课题和教育经济学的动向

——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上的发言(1984年10月23日)

厉以宁

我是学经济学的，对教育学不大懂，所以我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自己对教育经济学的一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特别是请研究教育学的同志多提意见。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经济研究的新课题和教育经济学的动向》。共分三个问题来谈。一、教育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二、当前经济学领域内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并与教育经济学有关的课题。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教育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关于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教育学家和经济学家很早就进行了探讨。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才开始建立和发展的。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应该说同战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进展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发展还包含社会、制度、结构方面的变化。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或增长经济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较早的经济增长研究系根据凯恩斯理论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分析其总收入、总投资、总消费、总储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重点是想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如何才能维持增长的均衡性。

但这种总量分析很快遇到了困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虽然对总投资、总消费、总储蓄之间的关系分析是重要的，但这种分析并不能替代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组合比例的分析，说明不了生产要素怎样组合，以及这种组合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后果。对生产要素组合的分析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样，到五十年代，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兼用了微观分析方法，研究资本和劳动力怎么组合。同以前单纯的宏观分析相比，这是一种进展。但既然讨论到资本和劳动力的组合，这就涉及到一个新问题，即劳动力的质量问题。劳动力有质量上的不同，既有熟练劳动力，又有非熟练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不同熟练程度和资本的组合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再进一步分析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按照传统的看法，经济要增长，或者使资本增加，或者使劳动力人数增加。现在发现，除了资本的增加和劳动力人数增加以外，还有其它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是些什么因素呢？包括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经济规模的变化，技术的进步，知识的进步等等。于是，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把对人力的投资作为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都包括在人力资本理论范围之内，都是对人力投资进行研究的。

经济发展理论（或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何才能发展。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战后有很大进展。有些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就象火车从火车站开出一样。比如说，发达国家有的上午八点钟发车，有的是上午十点钟发车，而发展中国家有的下午三点发车，有的下午五点才发车。尽管各国的经济发展有先有后，但火车都在同一条轨道上走，也要经过同样的地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发展中国家是正在走或将要走的路。发达国家以往在发展经济时，一直强调投资，所以

尽管该年自然灾害严重，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仍达到280元。工业由解放初期的几户私营作坊和一座石灰窑，发展到今天的包括机械、建材等107个大小企业，总产值比1949年翻了八番，巨大的成就，为振兴休宁经济、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初步基础。

但是，近年来，休宁县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家对林茶产品的优惠政策实现的，如果国家价格调高，休宁经济（包括产值、财政收入、人均收入）就会有较大的增长；一旦国家将价格稳定下来，休宁经济就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如果国家对这类产品价格适当调低，那么休宁经济就会受到重大影响。仅就1983年国家茶叶税率调低影响，休宁县就直接减收238万元，当年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减少了170万元，从这个意义上说，休宁的经济基础还是脆弱的，发展带有一定的被动性。

调查中的有关数据表明，休宁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及发展速度，同全国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离真正富裕还差得很远。

首先，从工农业总产值来看。

1978~1983年全国、休宁工农业总产值对照表

表一

单位：亿元

		1978年	1983年	1983年比1978年增长的%
工农业 总产值	全国	5634	9209	63.45
	休宁	0.6874	1.0320	50.13
农业 总产值	全国	1567	3121	99.71
	休宁	0.4523	0.6923	53.06
工业 总产值	全国	4067	6088	49.69
	休宁	0.2351	0.3397	46.74

度不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又需要分析各国为什么增长率不一样，通货膨胀率不一样，失业率不一样，等等。从此，比较研究方法就日益受到重视。这里有纵向的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还有二者相结合的比较，如把不同历史时期在同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的各国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方法同样适合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教育经济学研究者们发现，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现状，或研究某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是不够的，无法说明这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是多了还是少了，必须要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即既要同本国历史上的教育投资相比，又要同其它国家在处于相似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的教育投资相比。这才能有说服力。可见，比较经济研究的发展使得教育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深入了。

(二)、介于宏观分析(总量分析)和微观分析(个量分析)之间的总量分解方法。三十年代中期产生的凯恩斯理论是宏观经济理论，采用的是总量分析方法。它与二十世纪初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不同。尽管如此，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发现，总量分析是不够的。比如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能单从总量上或者单从个量上去分析，应该找出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总量分解方法。总量分解是指把总量分解为若干部分，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些被分解的总量部分，相对于总量而言，它们是个量，而相对于原来的个量而言，它们又是总量。总量分解方法又称部门结构方法。战后，这个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总量分解法或结构方法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是有用的。例如关于就业问题的研究，凯恩斯所研究的是一个社会的就业水平，这是总量分析。但就业问题不止是就业水平，还有就业内容。这就需要把总量分解，分析就业的

结构，探讨那种与空位并存的失业的原因，特别是要弄清楚为什么失业与空位二者不能互相填补。这就与劳动者的工种不同、技术水平不同等等有关。劳动力的质量如果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就会一方面有人失业，一方面又有职业空位。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进行劳动力的再训练，使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对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是有作用的。此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为什么有的空位有人愿意去填补，有的却没人愿意干。对这个问题也必须用总量分解方法。这是因为，职业被认为有好有坏，有头等和次等之分，有些被看成是“次等的”职业没有人愿意去干，这就涉及职业评价问题。对职业评价问题的研究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部分。

(三)、关于外部经济的研究。外部经济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表现出来的。例如，工厂所在的环境的变化会对工厂的盈利状况产生影响，如工资变化、能源供应紧张等；而工厂也会对外界产生影响，如造成污染、土地价格上涨、交通拥挤等等。经济学中关于外部经济问题的研究开阔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说，不能只从教育本身来研究教育经济，还要把教育同社会的相互影响，把学校同外界环境的相互影响考虑在内。把外界给教育带来的好处以及给教育带来的不利之处结合在一起研究，例如，大学扩大招生，使达到就业年龄的人中有很多人上了大学，于是至少在短期内会引起某个城市劳动力不足，引起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引起工业生产成本上升，不利于工业的发展。但这也可能加速工业的技术创新，对工业又有积极的影响。所以这里既有收益，也有损失。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的工业发展也会对教育发生两方面的影响，既有可能使教育因工业发展受益，也有可能使学校招生不足，使学校周围环境条件退化等。总之。

外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教育经济学研究更加深入了。

以上举了三个例子。它们表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同一般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分不开。目前，经济学正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以教育经济学绝对不会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必定随着整个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向前发展。

二、当前经济学领域内有待进一步探讨的与教育经济学有关的课题。

经济学曾被认为是一门最令人头痛、又最使人感兴趣的社会科学。也有人说，当前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中变化最大的一门学科。这种种说法也许不那么恰当，但不管怎么说，经济学领域内所遇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最多的。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今天只准备谈谈与教育经济学有关的几个至今未能解决的经济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世界性的。

(一) 什么是收入的合理分配？

这是一个至今在经济学中还有待解决的问题。怎样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这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用洛伦茨曲线来表示。假定社会上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收入。如果人人收入一样多，收入绝对平均，那么收入分配曲线就被认为是理想的曲线。我们不妨想一想，难道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吗？当然不是。在西方，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有一条表示收入合理分配的曲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所以收入绝对平均的分配曲线也决不是合理的。那么，按劳分配条件下收入差别究竟多大才被认为是合理的呢？究竟百分之几的人占有多大收入，另外百分之几的人又占有多大收入才算是合理的呢？这个问题到现在仍没有解决。我们不能认为收

入差别越来越小就是合理的,或者吃“大锅饭”就是最合理了;但也不能说收入差别越来越大是合理的。我们只能说,与贯彻按劳分配以前相比,实行按劳分配以后,收入差别肯定会扩大,但应当扩大到什么程度呢?用什么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呢?我们说不清楚。我们也不能认为,收入差别从大到小就等于走向不合理。假定通过某种技术教育而使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都提高了,收入差别也可能由大变小,但这种缩小很可能是走向合理。因此,收入分配合理性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收入差别扩大可能是合理的,但也可能是不合理的;收入差别缩小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既然如此,西方经济学中的洛伦茨曲线图对我们又有有什么用呢?当然,从总的方面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合理分配创造了前提。至于衡量收入分配合理性的标准和方法,我们至今并不清楚。

进一步考察,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收入差别缩小,经济效益可能降低。这就是说,吃“大锅饭”只会降低效率。收入差别扩大,经济效益可能提高。但差别过大,也会有消极的后果。这些问题还要深入探讨。国外教育经济学界最近十分注意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可以找到一种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就是发展教育。假定人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都有比较高的劳动质量,在这样的前提下,低收入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社会的收入分配可以趋向合理,而经济效益也会提高。尽管这只是一种假定,但也许比较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了。在收入分配领域内,教育经济学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例如,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分配的级差大小,人的天赋与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受教育者个人负担的教育费用和公共负担的教育费用的合理比例,等等。这些课题既有实际意

义，又有理论意义。

(二) 什么是资源的最优配置？

从理论上说，通过线性规划可以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方案。这是书本上的方案，不是现实中的方案：这种资源最优配置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无法预料，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书本上的最优往往和实际生活有很大差距。于是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出现了次优理论。次优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假定不能满足全部最优条件，达不到最优位置的话，索性不要求最优。比如说，要达到最优位置，应当满足三个条件，现在假定只可能满足两个条件，而有一个条件是实现不了的。既然实现不了这个条件，索性连那两个条件也不必要求实现了，不如退而求其次，取得次优解。次优解就是现实解。各种资源都应当按现实的原则，即以次优的原则来配置。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资源最优配置无非是指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但怎样才算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呢？目前也没有个标准。实际生活中，只要能把各种生产要素分布在比较合适的位置上，使它们能够发挥作用就行了。可行的就是“优等的”。不可行的，即使理论上再周密，再完整，也不是“优等的”。这方面的问题，至今仍在探讨中。那么，怎样才能接近于做到人尽其才呢？经济学研究表明，通过教育的发展，增加人才的流动性，从而增加职业的流动性，有可能接近于人尽其才。但如果没有人力投资，人才的流动性是不可能增加的。物尽其用也是这样。必须同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考虑。技术还有潜力，就是还没有做到物尽其用。这里又牵涉到教育问题，因为人力投资是实现技术进步的前提之一。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资源配置的结果应当实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没有通货膨胀，又没有人的失业。或者说，

既能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又能使人们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意味着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没有通货膨胀，商品比价合理，则有利于资源被充分利用。但这里也涉及教育问题。通过教育的发展，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这样就可以一方面使得经济不断增长，使多余的人力被吸收到经济中来，另一方面由于采用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维持物价基本稳定。所以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在为资源配置问题寻找答案。由于迄今为止，资源的最优配置仍是经济学中有待探讨的课题，所以教育经济学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研究也有待于继续深化。

(三) 技术进步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当前，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相当激烈。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悲观派，一是乐观派。悲观派认为，经济的增长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人类的前途是一片黑暗。所以增长率必须降到零，零增长才能解决问题。乐观派则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将会继续前进，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资源不足等问题将自然得到解决。这两派的争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论，看来也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应当承认，两派都有一些道理，但又都有片面性。悲观论者过多地看到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后果，而乐观派却只看到它积极的一面。

究竟技术进步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两种可能性是并存的：可能是悲观的，也可能是乐观的。这取决于“其它条件”，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其它条件”包括的内容很多，如制度的制约，人们观念的改变，人们对未来的了解程度和对自身命运的认识程度的加深，等等。这些又都同教育有关。如果今天不重视教育，不发展教育，不重视对技术进步成果的合理利用，不从

根本上解决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那倒很可能符合于悲观派的论断。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利弊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趋利避害。每个国家都要进行这种选择。这也是一个交替问题，就是说，以多大的资源和环境的损失来换取增长速度。比如说，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又不能不同时考虑环境保护问题，不能象发达国家那样，等到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而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才来考虑它。发展中国家应当及早考虑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不良影响。然而，这会不会使经济建设的速度下降呢？能不能找到一条既可以保护环境，又能使经济持续以较高速增长途径呢？这个问题正在继续探讨中。与此有关的是，教育部门需要研究未来的人才培养问题。技术进步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坏处。关键是未来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握技术，什么样的人进行管理，尤其是什么样的人作出技术决策。

问) 每一种经济增长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如何估计？

经济增长如何实现？除了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因素起作用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把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量统称为余量。那么余量如何分解，其中每一个因素究竟在经济增长中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解决。尽管国外经济学界已经做了很多计量的研究，肯德里克、丹尼森都是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的经济学家。但他们的结果还没有得到公认。困难在于如何把每一个因素从整体中分离出来，以及测定它所起的作用的大小。不妨举一个例子。一个化肥工厂，假如没有水的供应，它的产量就是零。但能不能把工厂的生产都归功于水的供应呢？那是不对的。再如，原来化肥产量是100

万吨，增加原料之后，产量增加到120万吨。那么，能不能把增产的部分全归功于原料呢？也不能。水和原料都是如此，可见要衡量人才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知识进步的作用的大小，就更加困难了。现在还找不到一种方法能够把某一种因素，特别是余量中的某一种因素脱离其它因素来单独进行衡量。在自然科学实验室中，也许可以看出在其它所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因素究竟起多大作用。然而社会不等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社会实践中几乎不可能使其它因素不变而单独估量某一个因素的作用大小的。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它们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因此，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作为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待于继续研究。

有些同志曾经问过我，如何衡量教育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我说这是很难准确算出的。当然，也不妨采用丹尼森的方法或其它某种方法试算一下，但我总感到其结果不能使人信服。我认为，这是教育经济学中的难题之一。

(五)、对经济学中的平衡理论，应当如何评价？

关于平衡和不平衡，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社会经济本身是平衡的系统还是不平衡的系统。在经济学中，这是一个实证经济学的问题。第二，社会经济目标应当是平衡目标还是不平衡目标。在经济学中，这是一个规范经济学的问题。两个问题有联系，但也有区别。这两个问题，争论已久，迄今没有定论。平衡理论和不平衡理论各有各的道理。总的说来，社会经济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但不平衡总有一定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社会经济就会崩溃。只要在限度以内，不平衡作为客观存在，并不一定会使社会经济发生严重问题。

人们经常说，社会经济就如同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有一种自我调节以恢复平衡的功能，如果自我调节机制失调，那么人就会生病。是

否可以认为，如果细分一下，人体有两种机制，一是亢进性的机制；一是抑制性的机制。亢进性是指发挥外向的、活动的、积极的作用。抑制性则相反，是指发挥内向的、保守的、消极的作用。这两种机制中，不管哪一种出了问题，人就会有毛病，但一般情况下，可以维持平衡，即既不过于亢进，而且即使有时亢进大于抑制或抑制大于亢进，不久也会自然恢复过来。社会经济也是这样。社会经济也有两种机制，一是扩张性的，也就是亢进性的；二是收敛性的，也就是抑制性的。二者相互制约，使社会经济大体上保持平衡。如果只有扩张而没有收敛，那就不得了，社会经济将会过度膨胀，以致走向崩溃。反过来说，只有收敛而没有扩张，那也不得了，社会经济将永远停滞或萎缩了。社会自己会调理自己，社会本身有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总的说来，社会是既平衡，又不平衡。政府的调节无非是在某一种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使之发挥作用，比如说，扩张性机制过强时，就设法加以抑制；或者，收敛性机制过强时，就设法给以刺激，其道理就如同病人服药一样。当然，在这方面还有不少争论，问题并未解决。

再谈社会目标究竟以平衡还是不平衡为好的问题。国外经济学界也在争论。传统观点总认为平衡目标是对的，但平衡目标也被一些人认为不一定好。比如说，国际贸易平衡目标就一定好吗？不一定。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容许有逆差，有逆差也许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在世界性通货膨胀条件下，增加了外汇储备不用，是会贬值的。还有，充分就业目标一定好吗？也不一定。也许有一定百分比的人失业，经济效益会更高一些。物价是稳定好还是每年有略微的上涨为好，这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在这里，不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平衡目标都是可取的。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理论上，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这些同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对教育经济学来说，这涉

及到研究中的更高层次，也就是与教育目标同经济目标的协调有关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教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等于是给社会看病开药方。看病就是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开药方就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目的都是如何使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在这里，社会是被当做一个病人看待的。既然把社会当做病人，那就应当了解社会本身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还应当知道目标何在，是让社会保持平衡还是容许有某种不平衡。这样，我们对教育经济学的认识可能会有所提高。

(六)、怎样认识社会经济变化的特殊性？

社会经济不会总是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社会经济中是不是也有一种介于连续变化与不连续变化之间的变化？比如说，经济增长过程是不是可以分解为若干阶段，有的阶段的经济增长表现为连续变化，有的阶段表现为非连续变化，而有的阶段则可能表现为介于连续变化与非连续变化之间的一种变化？如果说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出现这些不同类型的变化，那么制度的变化是不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社会经济变化本身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一回事，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对社会经济变化的认识则是另一回事。人与自然界是不一样的。自然界的变化能被人们察觉到，认识到，但自然界自己不会认识自己，不会认识人类。社会经济则不同。社会经济活动是人们进行的活动，而人们不但会察觉到社会经济的变化，会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且会调整自己的行动来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包括适应社会经济的连续性变化和非连续性变化。当然人们调整自己行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样，人们对自己行动的调整将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变化。这样，我们对社会经济

变化及其后果的认识，就要复杂得多。目前，经济学界对这些变化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展得不够。

举两个例子来说。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们并不同意资产阶级所作的解释，但我们仍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是连续性的、非连续性的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我们都要作出解释。不仅如此，我们更要了解由于这些变化而引起的人的行为的相应变化，以及后者对社会经济变化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我们同样应当从社会经济变化的特殊性的角度来分析由此引起的人们行为的变化，了解人们行为变化对于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比如说，社会主义的社会集资，这是一种变化，但这种变化一旦出现，它所引起的后果就是难以预料的。社会集资的发展，以后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公有制，而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公有制。

教育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关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特殊性的论述，是适用于教育领域的。我们要看到教育领域内的各种变化，更要研究这些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对教育和经济的影响。正如下面第三部分将会指出的，当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更高层次时，我们对社会经济变化特殊性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入。

(七)、如何才能同时得到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的好处？

这也是各国经济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从经济管理体制上讲，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是各有各的好处。集权体制可以克服分权体制的某些弊病，分权体制也可以克服集权体制的某些弊病。但怎样兼收二者的好处而又同时防止二者的某些弊病呢？各国都在进行讨论。西方国家一直是分权体制，在这样一种分权体制下存在着不少弊病，如失业严重，生产布局不合理等。苏联的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它同

样带来了很大弊病，如忽视消费者的利益，忽视产品质量、品种，资源浪费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南斯拉夫分权体制也是有弊病的，如分权以后积累率低，通货膨胀率高。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寻求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的适当结合。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城市经济改革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中，也包括这个问题在内。过去的集权体制，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如指令性计划比重过大，造成各种弊端；企业没有活力，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等等。但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仍需要有指令性计划，但它所占的比例应该适应缩小。东欧一些国家在寻找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之间的结合点时，着重要解决的同样是给予企业以活力的问题。

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有关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的利弊得失的衡量的讨论，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方面要探讨的问题很多。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将给教育体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次是教育体制本身如何才能兼取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的好处。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我们也正在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这是有待于我们大家努力去解决的课题。

(八)、个人行为与公共目标如何协调？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目标，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活动，个人的行为如何与公共目标协调，这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需要两种评价标准呢？比如说，任何个人的行动受个人评价标准的制约，社会的活动和公共的目标则按照社会的评价标准来检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两种评价怎样才能协调？当然协调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结合。而且实际上也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社会上的个人千差万别，他们的行为是无法统一的。但这个问题很重要，经济生活中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方法来